

# 印本差异与旧志整理

## ——以同治《大邑县志》为例

王 磊

**提 要：**旧方志的印本并不仅仅包括初印本及有明确标志的增刻本与递补重印本，还有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重印修订本。这种重印修订本对旧本大致有增、删、剜改、补注4种类型的改动。这种印本或并不被目录书著录，或误被当成其他印本的复本，往往为学界所忽略。在旧志整理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对这种印本进行调查，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整理底本，制定科学的整理凡例。在目录编制与旧志影印方面，也应该对这种印本加以重视。

**关键词：**旧方志 印本 差异 整理

### 引 言

我国旧方志数量繁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就著录8200多种。这些典籍是研究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文献宝库，提供了史学、文学、地理学、博物学、金石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的宝贵资料。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方志展开不同层面的多角度研究，诞生了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张革非《中国方志学纲要》、王德恒等《中国方志学》等通论性著作。对于旧方志的整理，也包括多个层面。如鲍永军《旧志整理述论》一文将其大致概括为资源普查；编制目录、提要、索引；影印出版；校勘、标点、注释、翻译；辑佚；专题资料汇编；数字化建设7个方面。<sup>①</sup>南江涛《中国旧志整理与出版概况》一文则精简为4个方面：目录编纂、影印出版、点校和数据库建设。<sup>②</sup>

所谓“印本”，是一个文献学术语，原指雕版印刷时期，利用一本书的旧板片加以重印而产生的不同书籍实体。在数字化出版的今天，根据一本书的初印文本进行多次印刷，也会形成不同的印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印本虽然以旧板片或旧文本进行重印，但往往会出现细节方面的改动。比较明显的是某些后印本会添加序跋或重印说明，这些文字清楚地交代了重印时间、地点、主持者、刊印改动等情况。学术界对这种印本的差别关注较多，如崔建英《旧板汇印本及著录》就较早谈到了利用旧板片进行汇印的古籍在著录方面存在的问题<sup>③</sup>；郭立暄《古籍整理规范与印本考察》一文明确指出调查古籍原刻翻刻、初印后印情况对古籍整理的重要性，强调在选择底本与参校他本时，不能仅仅依靠某个版本中的任一印本，而应全面调查所谓的“复本”是否与原本真的完全一致<sup>④</sup>。郭立暄的专著《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sup>⑤</sup>，对原刻翻刻与初

① 参见鲍永军：《旧志整理述论》，《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0期。

② 参见南江涛：《中国旧志整理与出版概况》，《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2期。

③ 参见崔建英：《旧板汇印本及著录》，《文物》1985年第1期。

④ 参见郭立暄：《古籍整理规范与印本考察》，《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⑤ 参见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中西书局，2015年。

印后印古籍的差异、鉴别、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的评判等重要问题做了大量深入分析，列举了诸多因为对刻印问题研究不足导致的古籍整理失误案例，再辅以彩色图版，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深刻的体验。在对旧方志印本差异研究方面，管见所及有唐光荣《道光〈城口厅志〉的三种印本》一文，讨论城口县档案馆藏本、重庆市图书馆藏本、四川省图书馆藏本三者之间的刻印早晚与内容差异。<sup>①</sup> 该文讨论的问题很具体，并没有上升到通论性质的高度，对方志研究者认识旧志没有明显标志的重印修订本的价值和研究意义来说，尚显不足。有鉴于此，根据笔者整理同治《大邑县志》的一些心得，草成此文，公诸同好并就教方家。

## 一 版本与印本

版本是文献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吴枫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七章说：“由于写刻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与刻印方式的不同，古典文献自然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版本。”<sup>②</sup> 吴枫也提到了印本，当然，这个概念是隶属于版本之下的。他说：“根据雕板先后，可分为祖本、原刻本、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sup>③</sup> 这里的初印本、后印本，就是从时间先后来说的。后印本既然不等同于重刻本，则应该是利用旧的板片进行重印。之所以进行重印，无外乎两个原因：原书印数不够，或者原书需要改动。对于印数不够的问题，书商也不一定完全因袭旧板，可能会为了吸引读者而重冠新名，或请名家作序，或冒充有名家审定、重校。至于原书本就需要改动，如读者反映旧本有错误，或新时代环境下旧本有违碍，或有新资料需要增补等，自然会在旧板的基础上进行改动。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几乎是不能径直认为重印本与旧本文字完全相同的。但由于重印的基础仍是原书旧板，即主要内容相同，所以这种印本隶属于某个版本之下，不会被认定为一个新的版本。通常来说，后印本会有明显的标志，或有序跋说明重印经过，或列职衔标注参加人员。如国家图书馆藏光绪二年（1876）增订本同治《大邑县志》，就有余上富所撰《增修〈大邑县志〉序》，其文云：“虽然，是志距赵虹冈前令重修甫及十载，以檄调之频仍也，非彰往考来，补苴罅漏，无以仰副当道采择。”<sup>④</sup>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年间重印本还有《光绪元年奉文增修姓氏》。这些标志都可以帮助我们鉴定不同的印本，并了解重印的时间及经过。

对这种有明显重印标志的印本，无论是纯目录著作还是带提要之目录，皆有明确认识。以同治《大邑县志》为例，《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同治六年（1867）刻本，同时在此版之下著录光绪二年林嘉澍、余上富增刻本。<sup>⑤</sup>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著录该书称：“光绪间知县林嘉澍（湖南安福举人）为之增修，未竟其功。继任者余上富（陕西拔贡）再续增梓行。……有同治六年刻本和光绪二年（1876）增刻本。”<sup>⑥</sup> 但由于编目工作者在对旧志进行鉴定时主要依靠这种明显的序跋与署款，并不会将馆藏复本或多个馆藏的同一著作进行具体的文字校勘，所以他们往往会忽略同一种重印本或增刻本自身是否存在无明显标志的再修订印本的问题。仍以同治刻、光绪二年增补《大邑县志》为例，《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在光绪二年增刻本之下，著录馆

<sup>①</sup> 参见唐光荣：《道光〈城口厅志〉的三种印本》，《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sup>②</sup>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2005年，第179页。

<sup>③</sup>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第180页。

<sup>④</sup> 余上富：《增修〈大邑县志〉序》，赵霖等修，余上富等补，王斌校注：《同治大邑县志校注》，巴蜀书社，2018年，第2页。

<sup>⑤</sup> 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748页。

<sup>⑥</sup> 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第21—30页。

藏地只有8处<sup>①</sup>，并没有著录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光绪重刻本。至于是无心挂漏还是将川大藏本等同于同治刻本，就不得而知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更没有谈到印本差异的问题。且两种著作皆将光绪重刻之时定在光绪二年，但其书卷8有“延龄桥，光绪三年陈芳建”<sup>②</sup>字样，可见仅据序跋与署款等，难以准确判定旧志重刻时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8处馆藏光绪重刻本是否完全一致，也值得怀疑。在此基础之上，传统古籍整理工作中以某本为底本、以他本中的任意一种为参校本的版本对校之法，就显得不妥了。

## 二 印本差异的类型

通常来说，重印本在旧板的基础上，所做改动不会太大，基本上会利用原有板片，只在细节处做一些更改，往往只是校订明显误字。以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刻本《大邑县志》与同治刻本相对照，二者差异并不大。但将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封面有“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七月初七日劝学所置”字样的重印本与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刻本相对照，差别就太大了。大致说来，两个光绪印本与同治本相比（为了论述方便，将国家图书馆藏光绪本简称为“初增本”，将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光绪本简称为“再增本”），有增、删、剜改、补注4种改动类型。

（一）增。所谓增，是指在旧板基础上，补刻新的内容。初增本与再增本由于增补篇幅相差较大，所以各有其增补特点。就初增本来说，增补内容不多，也就很少补刻全新的板片。初增本往往在旧板的空白之处见缝插针式地增刻新内容，并不注明“新增”字样，但由于增刻痕迹明显，所以很容易鉴别（见图1）。

再增本由于增补内容较多，除了在相应卷次之末分门别类增补相关内容外，对原板的增补还有剜改并篡改原文从而留出空白以增补新内容的特殊情况。如卷13《职官》表，为了加入同治七年（1868）的职官情况，将同治元年、二年、三年之内容平移4列，导致内容错乱（见图2）。

此外，无论是初增本还是再增本，往往会在新增内容之后注明“新增”“增补”字样，但也有不做说明者，或者即使注明“新增”，却是同治本在乾隆本基础上做的增补，需要特别注意。再增本虽然做了大规模的补板新刻，但也延续了初增本“见缝插针”的做法，比如明明该增补于卷11《寺观》之末的内容，但由于卷10《祠庙》之后刚好空出半叶，遂补于卷10之后（见图3）。

（二）删。所谓删，是指对旧本有明显错误的地方或不该收录的内容进行刊削。如同治本的卷18，收录有一首署作者“文同”的《题雾中山碧玉潭》，此诗不见于《丹渊集》，今人胡问涛校注文同别集时即据之辑补。但这首诗并非文同所作，“千崖角逐互吞吐，一峰拔起矜崔嵬。日光微漏见潭底，水气上薄云成堆”4句实为陆游《山中得长句戏呈周辅并简朱县丞》之第二、三联。据《剑南诗稿校注》，该诗的确乃“淳熙元年九月作于大邑”<sup>③</sup>，但由于同治本在本卷之后又收录了陆游原诗，故标明作者为文同之诗实为误收，应删去。只是这种删削并不彻底，比如卷18收录陆游《宿上清宫》2首，乃题咏青城山者，与大邑无关，也应该删去。某些重复内容如卷4《山川》引李膺《益州记》，卷19又收此条，应该删去或利用互见法说明。除了卷19所收汪濊《志补正误十条》对某些该删削的内容略作说明外，初增本与再增本对其他删削的情况并未给出理由，多有不妥。但总体来说，删削的内容比增补的内容少得多。

<sup>①</sup> 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

<sup>②</sup> 赵震等修，余上富等补，王斌校注：同治《大邑县志校注》，第89页。

<sup>③</sup>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60页。

(三) 删改。所谓删改,细分的话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旧本有误,删去误字而重刻正确文字。如卷9“谨遵次序供奉”之“奉”,同治本与初增本皆作“俸”,再增本就删改为“奉”了。又比如再增本在卷17增补了4位烈女传记,所以将统计数据之“以上完节贞孝烈女共六十名口”之“一”删改为“五”。另一种情况是删掉旧有的错误或重复内容,增补进去新的内容。如再增本卷17“李荣山妻董氏。二十一岁夫故,城居,贞洁守志,抚孤。已阅二十年,存”<sup>①</sup>,同治本与初增本此处皆作“杨玉琦妻余氏。二十一岁夫故,年五十七卒”。由于后文“列女补遗”有对此妇更详细的记载,所以再增本就删掉此条并补入李荣山妻之事。这一类删改条目较多,给文字校对工作带来不少难度。

(四) 补注。增、删、删改3种操作都要尽量避免对原有板片进行大的改动,如果这3种操作可能造成原板的面貌变化太大,增补本就会放弃直接删削与删改等操作,只是在相应条目之后补刻附注。比如同治本在《艺文志》中大致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作品的,但偶尔有将清人作品混在明人诗文中的情况。若求全责备,增补本自当删改并移动位置进行补刻。但这样对原书内容影响太大,不具备可操作性,所以只在某些诗文的题目之后补刻注文加以说明。如同治本卷18收录陆游《上清宫》诗2首,乃误收,应该删去,但如果删掉原文,会留下大量空白,所以再增本就在诗题后补刻了一句“考《剑南诗稿》,合下二诗系灌县青城山作,旧《志》误收”。又比如同卷同治本收录《鹤鸣山思仙歌》,乃道光末年所作,不应该混在明人诗歌中,所以再增本就在诗题后补刻“系道光末年人作,宜移国朝诗后”句。

### 三 印本差异与点校、编目、影印

前面我们举例分析了旧志印本之间存在的多种差异,这些差异乃至不同印本的存在与被发现,对旧志的整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根据鲍永军《旧志整理述论》一文,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对旧志展开整理工作,是从1984年旧方志整理工作委员会成立开始的。旧志整理涵盖了多个方面,每个方面对旧方志的整理程度不同,产生的作用不同,取得的成绩也有差别。总体来说,在各省市各级方志办工作同志的齐心协力之下,对旧志的普查与编目、编提要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进入新世纪之后,得益于出版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古籍影印方面的发展,一系列大型方志丛书影印本得以出版。而对旧志进行点校与注释,却是所有整理工作中进度较慢、取得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的一种。制约这项工作的难点有多个方面:基层地方志工作机构研究能力不够,旧志的不同版本获取困难,学术界研究力量一般不愿意介入旧志整理工作……如果说前两个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逐渐得到改善,最后一个问题却仍然不容乐观。毕竟,现在无论是高校还是研究机构,对“古籍整理”都不是很认可,更不要说对仅仅局限于一地的旧方志进行整理了。正是因为这些难点的存在,目前的旧志点校存在质量低、错误多等问题。大多数只是找一个版本,专业一点的会做版本鉴定,更随意的则是随便找一本,进行文字录入,加上新式标点就完事。这种粗糙的标点本,对于研究者来说,根本不值得参考;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错误太多,反而容易让人误入歧途。某些整理者会对旧志进行注释,但要么是“人皆知之我详言之,人皆不知我亦不知”;要么将读者的水平预设得太低,随意出注,连篇累牍;要么是不讲文献证据,不说资料出处,只管信手拈来。这样的校注本不能满足新时代对旧志整理的要求,而站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随着越来越多的旧志藏本被发现、影印和数字化,旧志整理工作也有了新的任务。

(一) 点校。版本调查是古籍整理的第一步。先前的旧志整理者往往不是很注重这个问题,

<sup>①</sup> 赵震等修,余上富等补:同治《大邑县志》卷17,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增补本,第28页。

题，基本就是根据某一个初刻本或增刻本进行点校。《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之后，不少研究者根据这个目录的统计情况，采用将该书著录的初刻本与增刻本任选一个藏本对校的办法，就算是完成了校勘工作。而随着旧志不同印本的披露，我们认为，这样的对校办法不能反映某种旧志的诞生与演化全貌。仍以同治《大邑县志》为例，该书经过光绪二年的初次增补，但这部被认为重刻于光绪二年的作品中，却出现了对光绪三年史实的记载。第二次增补尽管时间不明、主持者不明，但并不意味着这部著述地位低下。虽然在古代存在私人修志的情况，但这样大面积地进行增补，尤其是增补人物传记、增补诗文、刊削、剜改旧文，如果不是得到相关方面的首肯与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对于这样的旧志进行点校，在校勘方面就面临着收集印本的难题。那种只大概看看序跋就确定刊刻年代，就认为诸本一致的传统做法，已经存在风险了。

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利用相关目录，全面查访这些旧志的馆藏情况，重点比对职官志、人物志、艺文志、选举志这几个时效性很强的部分，看有无增补情况，只要存在增补内容，就不能马虎，应该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印本进行通校，因为我们不能保证在其他内容方面没有很细微的剜改、删削、补注等差异。这样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以笔者在泸州市图书馆访书的发现来看，该馆所藏嘉庆十八年（1813）本《峨眉县志》，比四川省图书馆所藏嘉庆本多了一篇宣统三年（1911）宋知县的跋文；而该馆所藏宣统三年《峨眉县续志》，则在全书末尾比四川省图书馆藏宣统本多了3页当时捐资刊刻县志的人员名单与捐款账目。这还是我们粗略翻阅发现的差异，如果通本对校，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呢？所以，笔者认为，以后的旧志点校工作，尤其是想备齐众本详加校勘、全面反映旧志的文本面貌，一定要注意对印本的考察。不要因为目录著录为馆藏复本、不要因为既有的提要著作已下的判断，就认为这些本子内容全部一致，从而遗珠沧海。

（二）编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成书较早，随着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深入以及海外汉文古籍的渐次公布，这一目录已经显得不够完备了。但要对该书进行补订，是一个浩大工程，不能急于一时。笔者认为，新时代背景下，大数据带来的丰富信息，可以为基层地方志工作者调查当地旧志馆藏提供不少便利。那么，他们可以先从本地旧志的收藏情况着手，全面考察这些藏本之间的异同：是否属于不同的版刻系统，是否属于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这些基础工作做好了，既便于进行高质量的文本点校，也可以为地区性的目录著作乃至全国性的目录著作提供坚实的基础。这项工作有一定难度，但并非无法完成，不需要对不同藏本进行全面校勘，只要在容易发现增补内容的地方稍加留意。由于补刻或剜改往往在字体、字形方面与旧文难以统一，所以只要每一页都亲自翻过，是很容易发现蛛丝马迹的。更何况，某些藏本尽管从文本内容上看完全是同一个印本，也会出现有前人审阅批注的痕迹，这些批语对于整理旧志来说，也很有帮助。比如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九年（1611）《嘉定州志》抄本，就有不少朱笔旁批，改订了很多错字。

除了地方志工作机构需要全面调查当地旧志藏本与印本情况外，相关藏书机构在编制馆藏旧志目录时，某一地区在编制区域联合目录时，也应该重视对馆藏复本的鉴定。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做出新的提要，那就功莫大焉了。

（三）影印。关于旧志影印的情况，南江涛在《中国旧志整理与出版概况》中做了介绍，主要包括台湾成文出版社的“中国方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与巴蜀书社合编的《中国地方志集成》；以及后来以藏书机构命名的“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系列。但这些影印本往往强调“稀见”，选择版本较早、保存较好、存数不多的旧志进行影印，实际上仍有不少比较珍贵的版本没有公布。比如现存最早的四川总志正德《四川志》，据《中国地方志

联合目录》，只有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刻本，川大所藏为影抄本，四川省图书馆所藏为抄本。虽然地位特殊、存量稀少，但正德《四川志》这么多年仍未影印出版，最新的《四川历代方志集成》也没有影印收录。又比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版《四川总志》，馆藏亦十分稀少，也尚未影印出版。这些较为重要的旧志都尚未影印扩散，那些被认为是一般旧志的复本但实际上却是不同的印本且有着独特文献价值的旧志，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不对印本加以重视，长此以往，影印也好，研究也好，都会围着易见的藏本转，一些本子反复被影印，另一些却一直得不到影印，形成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当然，笔者并不建议将每一个藏本和印本都影印一遍，至少在某种书某个藏本已经被影印的情况下，下一次类似的丛书影印计划，应该考虑该书的其他藏本或印本，避免重复劳动。

## 结语

这些年来地方志整理工作逐渐朝着深度与广度发展，更多藏本被发现、被公布，旧志原本或影印本甚至电子扫描本也易见，这就让学术界以及所有需要用到旧志的人对点校本旧志有了更高质量的要求。要满足这个要求，最基本的是做好文本校勘工作。文本校勘则离不开版本与印本的调查，目前尚未形成重视旧志印本的观念和风气，需要地方志工作者以及古籍整理研究者加以提倡。笔者虽然研究古典文献学并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但在旧志整理上经验并不丰富。本文仅以同治《大邑县志》的一个特殊印本为例，简述印本差异的特性以及与旧志整理的重要关系，抛砖引玉，希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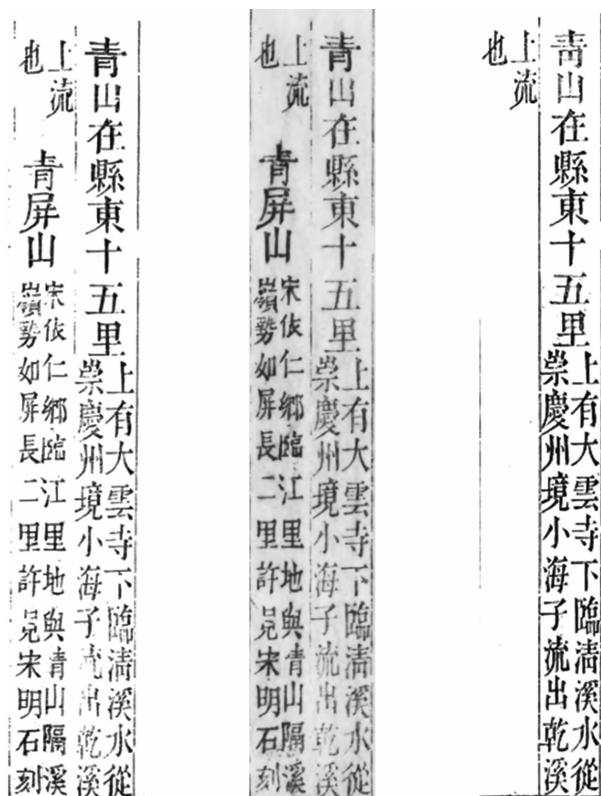


图1 《大邑县志》刻板（从左至右分别为再增本、初增本、同治本）

四年	七年	四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四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同治元年
趙霖	趙霖	趙霖	趙霖	徐震翹	王廷綬	趙霖	張申五	張申五	張柄謙	顧穎	顧穎	顧穎	顧穎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代理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徽太平縣	徽太平縣	徽太平縣	徽太平縣	徽太平縣		徽太平縣	溫江縣	溫江縣	江蘇人	江蘇人	江蘇人	江蘇人	江蘇人
即有督聲	拔貢到任	拔貢到任	拔貢到任	附貢現任		附貢現任	任	任	都人	都人	都人	都人	都人
北竹縣	北竹縣	北竹縣	北竹縣	人現		人現	人現	人現	福建人	福建人	福建人	福建人	福建人
任人現	周灝	周灝	周灝	張柄謙	顧穎	周灝	葛壽鋐	葛壽鋐	馬國珍	馬國珍	馬國珍	馬國珍	馬國珍
人現	秦利	秦利	秦利	合江人	李襄倫	秦利	人著	人著	之成	之成	之成	之成	之成
任人現	葛壽鋐	葛壽鋐	葛壽鋐	姜由範	劉	葛壽鋐	葛壽鋐	葛壽鋐	李襄倫	李襄倫	李襄倫	李襄倫	李襄倫
人現	福建人	福建人	福建人	溫江人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人著
任人現	馬國珍	馬國珍	馬國珍	朱滋元	朱滋元	馬國珍	馬國珍	馬國珍	李襄倫	李襄倫	李襄倫	李襄倫	李襄倫
人現	之成	之成	之成	崇慶人	崇慶人	之成	之成	之成	安岳人	安岳人	安岳人	安岳人	安岳人

图2《大邑县志》刻板（左为再增本，右为同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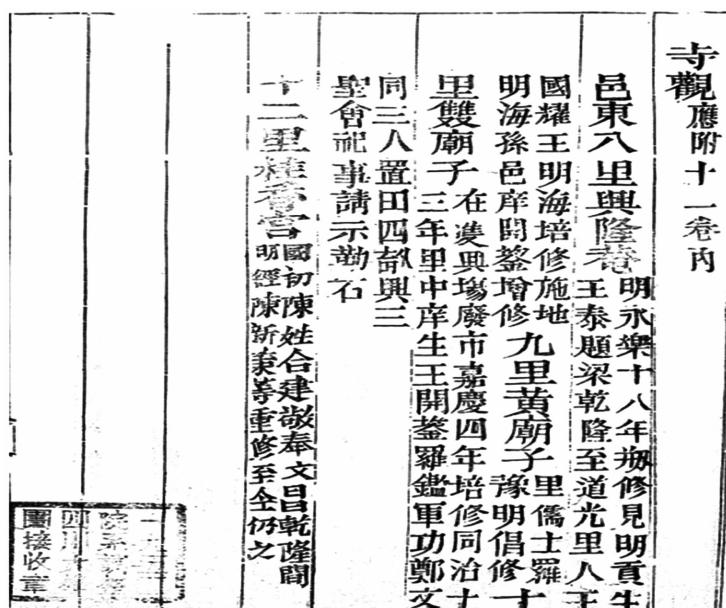


图3《大邑县志》再增本刻板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地方文献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周全